

二十三、被默认的解冻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传统戏曲率先恢复了一些剧目。

第一个“闹得水响”的是《逼上梁山》，因为恢复它有惯见的标签可贴，毛主席在延安看了平剧(即京剧)《逼上梁山》后给平剧院的一封信，足以封住动不动就批判的那些人的嘴。于是全国各地都响起林冲那悲怆的歌唱。地方戏曲也紧跟跟进。

看了十年样板戏的人们，突然发现传统戏是那么绚丽多



1984年到昆明讲课。大观楼下发思古之幽情也没忘带太太——谁让人家长得美！

我叫“活着” (二十)

◇何祚欢

彩，封箱十年的戏装终于可以见阳光，见观众了。剧场门口，“看老戏”的长龙难得地再现于现实之中。

伴随着这火爆的，是对传统批判的停歇，于是相类似题材的《林冲夜奔》、《野猪林》等都恢复上演。再下来，就轮到《铡美案》、《秦香莲》这一批戏了。

曲艺界也兴奋起来，也谋划着恢复一点保留节目。有些团体早就打出了恢复传统的旗号，把老相声、老鼓词搬上了台。武汉市说唱团里的老演员也开始往外“掏宝”。

然而曲艺和戏曲不大一样，它历来都是以贴近生活、贴近时尚来赢得人心的。取材于史传的节目，除了《三国》等少数长篇评书外，一般都不太受欢迎。说唱团里的太平歌词《姜子牙卖面》、

京韵大鼓《鞭打芦花》、《关黄对刀》等一大堆出自正、野史的节目，早就成为“怎么上去怎么下来”的过场戏。其原因就是它们离今天的生活太远。1977年末团里推出的传统相声《大保镖》，当年可是火得冲穿屋顶的，而此时再演却是个冷冷清清，其原因是观众对保镖毫无印象。与此相反，夏雨田为批判“四人帮”而创作的节目，却成为大火的节目。特别是他为胡必达“度身定做”的两个相声段子，让观众再次迷恋起了胡必达的节目。节目中的“白洛克”，更成了必达那一段时间的代号。

我拿什么来“应门市”？评书的传统节目不可谓不多，但让我像地方戏那样，扯个与林冲、鲁智深沾亲带故的故事去火爆几天，我又办不到。于是，我一边用1972年以后创作的一些节目顶上

场,一边酝酿创作新节目。

其实我打心眼里怀念那些演得得心应手的节目,那是在台板上“滚”出来,经得住摔打的东西,论内容,也多是歌颂党、歌颂毛主席、歌颂革命的。“文革”一来,它们突然就被“毙”了,再会拐着弯儿想的人也想不转这个道理呀。

但“文革”中不敢去接触这个话题,它就像个疤,怕只怕轻轻一挖会挖出个钻心的疼痛,倒不如不挖。

经常有朋友问《双枪老太婆》那些节目不能演了,节目当中的“硬包袱”就可以拆下来用啊,那是效果啊。我说:“我不能那样做。那些包袱是那些节目的组成部分,不是随意拆卸拼装的零件。若为了一时的火爆把它们卸下来用,那些和它们相关的节目就废了。”

那时,对一般人说这些话是很犯忌的,我的朋友听了,也有人开玩笑地说过:“你的意思,你那些节目还有重演的机会?伙计,你是‘梦想收回失去的天堂’呢!”我往往是一笑带过:“一个说书的,再好的天堂也是说书。”

这个时期,我选择了最容易通过的题材连续

写了两个短篇。一个是写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掩护民主人士的《山城斗智》,一个是写周总理在武汉保护《新华日报》的《江畔雷霆》。

《山城斗智》一完成,我即寄了一份给辽宁本溪歌舞团的田连元。我们自1976年在北京调演中认识以后,就一直交流着演出节目。他的《潜伏》我一直在用,在教学中还教给了不少学生。我的《五分钱》他也一直在用,据他说,后来还被另一位同行收进了自己的创作集。这次的《山城斗智》,连元一接到就上了,成为那段时间的“响活儿”,很快被推荐上了中央电台。那会儿上电台就不易,上中央台,了得!我听了也高兴,因为那毕竟是我的作品。

1977年年尾将近,团里因为上半年搞运动、加工资(那时加工资也像运动,要几番讨论,统一思想,三榜定案,颇费时间的),眼看还缺近30场演出才能完成局里下下来的场次指标。几位领导柳华珍、吕讷、刘汉庆、陈彬急得不得了。柳华珍私下对我说:“哎,你的主意多,眼下团里分两个队演又不可能,又必须在短时间演满那么多场,该怎么办?”

我一听就明白了,这是书记在给我递话呢,她这么问我绝不是因为我主意多,而是希望我主动接任务。我们这一代人一直都认为主动负责是一种光荣,如果领导暗示了而你不接茬,还要由他们说白了,你即使接了活儿,也会为自己的迟钝而自耻。所以,我听完了这话忙不赢地就接了腔:“怎么不能分两个队?我不是带着徒弟走过单场吗?独奏音乐会算晚会,评书晚会就不算吗?”

柳华珍笑着说:“我就知道你有点子。你们师傅完成10场有没有把握?演出地点放在哪里?”

我说,这回是完成巡演任务,不是带徒弟练台,所以就要走基础好、人气旺的地方。我和孙仲江可以完成12场,只走京山、汉川两个县就可以了。

京山县确是我生命中的福地,它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我于要帮之时,救我于必救之处。1977年12月初,我带着徒弟去和文教局一联系,局长邓文就把这事交给了张长缨,张长缨立马联络各方,作开演前的准备。

由于县楚剧团的《秦香莲》正在热演中,县里唯一的大剧场县礼堂一时空不出来,我们的演出就被安排在了县工会的俱乐部。售票、收票等前



为寻荆山之玉,何惧形象不雅——保康之行



心情好景色才好,若不是我们的笑容,这景就看不到了

台一应杂事都由文教局派人担当,工会只出人管灯光、音响,到时候管拆账。这里四场演罢,再在县礼堂安排一个周日专场。我有感于文教局的全力支持,就特意提出周日场的收入拆账改为3:7,文教局方面比2.5:7.5的惯例要高5个百分点。文教局局长邓文一听非常高兴,让张长缨与县招待所联络,请食堂为我们按一天一元钱的标准为我们开小灶。没想到食堂开不出菜谱,不敢接这个活儿,邓文的好意只有作罢,不过还是说好每餐另加两个菜,标准定为8角。就是这一加,也把我们师徒,还有全陪的张长缨“挺”住了。我历来是能吃会睡的,朋友中调侃时常说我是“酒囊饭袋瞌睡虫”,那几天却怎么也吃不完那些靠“堆垛”取胜的菜,张长缨只得每餐约个把两个人,来帮忙“消灭”它们。

这样的聚会,免不了要谈天说地,那些看似不着边际的故事,看上去成不了故事的人物遭遇,便不时地撞击我的心灵,推动着我的创作灵感。

在京山演出的几天,我一方面要为一共五场演出的节目发愁,一方面在演出之后梳理着心里萌发的作品线索。

先说节目的艰难安排。五场节目我起码要开出12~13个短篇,这在上世纪60年代也许不难,但在1977年年末那个两不搭界的时刻,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。“文革”前的创作节目是得心应手的,但没有领导点头或发话,以我的胆量是不敢贸然“复辟”的。那么就只有在1972年以后的节

目和看上去可以开放的传统节目中找了。

像《西门豹治邺》,原本是破除迷信和陈规陋习的,可是“评法批儒”时西门豹被“定”为法家,他的治邺就得给贴上“反儒”的标签。1975年前后演出时它的效果非常火爆,原因只是在一个个包袱的连环响上,基本上没批儒的什么事。它被列入节目单中,我估计犯不了政治错误。

再如《水浒》中的精彩片断《武松代嫁》、《十字坡》等等,都可以借《逼上梁山》的话头拿出来。我就把火爆的《武松代嫁》放到县礼堂的周日专场,而《十字坡》放到工人俱乐部的四场之中。

其它还有1973年改编的《飞车捉狼》,1975年创作的《双花轿》,1976年改编的《刀对鞘》等等。反正五场节目除了孙仲江的《夜走长湖》是一演到底,我自己可是没一场重样的。

再说创作上的感悟。

朋友们谈的事,有几件撞动了我的心灵,他们说到了一位副县长,“文革”前是文教局局长,“文革”开始时被打成了“黑帮”,“文革”中期全家下放“五七干校”,原以为会平静地务几天农,不想这次倒是夫人在“后院”放火,把他家里的牢骚话当反动言论捅了出去,使他到了脚踩牛粪之时也无法“放眼世界”,因为挨斗时他总得把头低着。后来他平了反,在家里却不敢和夫人谈话。无可诉说中,他只得与酒为伴,常常面带潮红,口喷酒气,步显醉态,身有醺意。到后来升了副县长,依然会在公务之余以酒盖面,在外面晃晃趋步,在家里讷讷向人——因为那人绝不是“帘卷西风”处的佳人。

我能体会这种亲人不是真亲人的痛苦,我在很长时间里都念叨着:“麻木县长,麻木县长……”武汉人把有餐必喝,每喝必醉的人叫“麻木”,可是古往今来多少人是无奈而爱酒,又有多少人是爱酒而无奈啊。直到1983年,我找到了一个积极的角度,写了一个5万多字的中篇《麻木县长》,把主人公为科技献身的理想和“文革”中

的无奈放到一起写,才觉得表述了一回自己特有的心得。在一次准备汇演的审查中我演出了其中一段,听众的反应还真不坏。后来我觉得它的全篇有些犯忌,就没再继续说它。再后来觉得它在科技方面的“由头”多少有些外行,便自动放弃了。其实这个中篇在刻画人物上真比其它几个中篇强一些。当时若耐心一些,把那些显得外行的东西改改,它不会比《彩电风波》差。不过这对于1977年年末来说,已经是“后话”了。

“麻木县长”的经历,使我想起了“文革”中,种种被扭曲的事,许多被扭曲的人格,还有风雨如磐中那些不改本色的人们。这就是我后来写《挂牌成亲》的灵感之源。由于后边有专章表述,这里就不再说了。

总之,粉碎“四人帮”带来的思想解放,在那时已经开始萌动,我对自己保留节目的“启封”,便时时存有一种“三岁的伢玩爆竹——又爱又怕”的心理。骨子里爱的是一旦解冻我就能有几块“响活”。

这个机会,在不久后的慰问解放军中被我等到了。

那年月的慰问解放军,是地方干部和文艺团体都盼望的事。地方上的人们平日生活都是干巴巴地靠计划维持,部队里的生活虽不宽裕,但在节日接受地方政府的慰问时,为了表现“军民一家亲”的气氛,就竭尽全力拿最好的东西招待慰问团,这样,慰问团接受慰问就成为公开的秘密。不同的是“文革”中慰问团所到之处大家都要绷着脸说一些套话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1978年春节慰问就显得宽松多了,话也说得直率了。我们慰问团在荆门,领队的工宣队队长在宴会开始前的讲话是这样简化:“同志们,我代表湖北省慰问团,向人民子弟兵官兵表示衷心的慰问。好了,大家吃呀吃呀,喝呀喝呀!”

说唱团也不像前几年慰问那样,没演出就学习政治,而是多了些自由活动。同事之间的玩笑、恶作剧也开始为宽松的气氛作注。

我是团里头号大脚。那一回我穿了双棉鞋,带了双皮鞋。那天把棉鞋放到阳台上去晒,晒到晚上,两个鞋帮上被各贴了一个标签,手写的,一个写着“江顺”,一个写着“江华”。这是长航走上海的两只大船的名字,看样子,我的鞋该下水载人了。我认出那字体,便叫着“×,卖船票!”

台上台下气氛的松动,使我们的慰问演出变得空前地火爆。胡必达、陈尚忠的相声火,夏雨田、杨松林的相声火,顾耀宗的拉戏火,我的评书好像更火。

下来一打听,这支部队是一支通讯部队,他们的军营原本在汉口中山大道兰陵路和黄兴路之间,近年才迁来荆门的。从前对我的节目就熟得要命,这回可是要过足瘾了。

这一“过足瘾”不要紧,一晚上两次、三次“翻头”可真考量人的肚子。而且在我们连演了三晚上之后,又应要求加了一个夜场。到了这一步,我剩下的节目就不算火爆节目了。我想,这情况,是否就到了我该拿“存货”的时候呢?

先不管有没有人批准,我在私下里可就铆上劲了,《双枪老太婆》十年封箱,也算得“大雅久不作”吧,若此时能变解冻时,毫无准备也许就会让“双枪”当中的一把枪哑火。于是,我在那个加场的白天把孙仲江喊到一边,让徒弟给我当观众,为他一个人演了个专场。

孙仲江听完这一段,眼睛都放出光来了,他说:“师父,这块活儿口口都是肉,我要学!”我一边点头一边骂道:“用得着你说吗?我教那么多业余朋友都教了,自己的徒弟我还会保守吗?现在还得找人点头呢。”

我心中惴惴,首先找到副书记陈彬,试探着说:“老陈,这几天连演带翻把我的节目都逼干了,今天加演怎么办哪?”

陈彬不相信:“你有那多节目,三四场逼得干?”

我说:“有倒是有,《双枪老太婆》,行不行沙?”

他说:“照说它是讲革命传统的,问题不太大吧。”又带了尾巴说:“你先准备着,我不叫你换节目,你就上它。”

一直到上演前,我都希望陈彬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但到了上场之前,我又觉得没底了——到底演不演哪?一句准话没有,我真地往上冲?

不多时报幕员上台了,《双枪老太婆》五个字一报完,就招来了热烈的掌声。到了这一步我还等什么人哪,等不来就只有硬着脖子上了。一走出台口我才明白,陈彬就在台下坐着呢,他是不是也和观众、和我一样,盼望着这个曾招人喜爱的作品呢?

(待续)